宋代江西的史學

王 德 毅

一、前 言

近十餘年來，我對宋代史學做了甚爲深入的研究，至今已發表之論文多達二十餘篇。於宋代史學何以特別興盛，各種史學著作何以如此的既富且精，而史學家又何以特別傑出，皆有詳明的敍述與論評。至於就地區而論，也有一些特徵出現，史學家有集中於某些地區之事實，卻可以說明該一地區的學風。有的父子兄弟都嗜史學，又呈現家庭的薰陶對一位史學家的養成是很重要的。就宋代而言，四川、江西兩地區的史學家最多，浙東、福建兩路則次之，前兩地區由北宋到南宋始終不衰；後兩路則集中於南渡以後，其發展歷程是頗爲不同的。今特先對宋代江西的史學加以研究，來探討這一地區的史學特徵。

宋代文風特盛，在北宋時，江西也誕育了十多位傑出的文學家，如晏殊、幾道父子的詞，歐陽修、曾鞏、王安石的古文，被列在唐宋八大家中。黃庭堅、洪朋、謝逸、徐俯等之詩，是所謂之江西詩派。其他如劉敞、攽兩昆仲，孔文仲、武仲、平仲三兄，皆爲一時之傑。已爲江南諸路之冠。然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？此當從五代時說起：蓋五代政權的遞易，兵連禍結歷五十多年，所幸戰亂地區僅僅限於黃河流域，淮河、長江以南所被的戰禍則甚少，而割據一方的區域政權，反而可以維持安定，並能保存一些唐朝的文風。生長在衰世而且有志於向學的青年，仍然想找一個不受干擾的地方去苦讀，以待異日天下一統，一展救國救民之志。在江西南康軍之廬山十分清幽，唐穆宗時，江州刺史李渤即在此山五老峰下建堂舍亭榭，種植花木，命名白鹿洞精舍。南唐昇元中，乃就地增建學館，創置學田，以給養諸生，並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任命李善道爲洞主，負責教授之事。於是學子大集，當時稱爲「白鹿國庠」。① 臨江人劉式便曾到白鹿洞讀書，苦讀五、六年，很有成就，據其孫劉敞述其事狀云：

> （府君）諱式，字叔度，少有志操，好學問，不事生產。年十八九，辭家居廬山，假書以讀，治左氏、公羊、穀梁春秋，旁出入他經，積五六年不歸，其業益精。是時天下大亂，江南雖偏霸，然文獻獨存，得唐遺風。禮部取士難其人甚，叔度以明經舉第一，同時無預選者。由是江南文儒大臣，自張洎、徐鉉皆稱譽之。②

劉式生於南唐元宗保大七年（九四九），到十八歲時，已是宋太祖乾德四年（九六六），南唐亡國時，式年僅二十有七，降宋後，官至判三司都磨勘司，太宗至道三年（九九七）卒，年四十九。當式讀書白鹿洞時，每日手抄《孟子》、《管子》等書，又勤於收藏，一生蓄積之典籍達數千卷，名曰「墨莊」，而病死時，五個兒子尚未成立，其夫人陳氏勉諸子苦讀先人遺留下的圖書，後皆考中進士，在以後的接連五代中，又有四代中進士，內中有兩位史學大家，遂成爲江西名族。③ 朱熹在淳熙六年（一一七九）知南康軍時修復白鹿洞書院，充實圖書，該書院遂爲南宋培育衆多的大師名儒，江西的文風更盛了。而士大夫之家又多尚學術，家學師承同時並重，而振家聲、承家學又被視爲賢孝之大者，當時風俗是淳美的。如朱熹所說：

> 非祖考之賢，孰能以詩書禮樂之積厚其子孫；非子孫之賢，孰能以仁義道德之實光其祖考。……蓋磨勘公五子皆有賢名，中子主客郎中實生集賢舍人兄弟，皆以文學大顯于時而名後世。④

江西多世家，臨江劉氏只是一個例子，他們或父子或兄弟、或伯叔姪皆爲史

① 見王應麟《玉海》（大化書局影印元刻本）卷一六七〈白鹿洞書院〉條。
② 見劉敞《公是集》（叢書集成本）卷五十一〈先祖磨勘府君行狀〉。
③ 見朱熹《朱文公文集》（四部叢刊本）卷八十一〈跋白鹿洞所藏漢書〉。
④ 見《朱文公文集》卷七十七〈劉氏墨莊記〉

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資料庫

學家者，實較他路爲多，這確實是一獨特現象，是值得研究的，故在此先敍述江西的史家，再綜述其史學之特徵和貢獻。

二、宋代江西的史學家

宋代江西的史學家，以籍貫臨江的最多，其次饒州，其次吉州，筠州，舉其曾參與國史之纂修，或有史學著作傳於今日的，姑列舉十五位，北宋六人，南宋九人。

㈠歐陽修

歐陽修（一〇〇七至一〇七二）字永叔，晚號六一居士，永豐人，自署廬陵人。四歲喪父，由母親教育成人。他天賦聰明，博覽群書，於仁宗天聖八年（一〇三〇）中進士甲科。他嚮慕古文，厭惡駢體，立志扭轉唐末、五代的陋習，唱爲古文運動，爲文章必本乎孔子春秋之義、禮樂之實，以合乎大道，當時知識份子共同尊稱他爲「今之韓愈」。蘇軾便這樣說：

> 宋興七十餘年，民不知兵，富而教之，至天聖、景祐極矣！而斯文終有愧於古，士亦因陋守舊，論卑而氣弱。自歐陽子出，天下爭自濯磨，以通經學古爲高，以救時行道爲賢，以犯顏納諫爲忠，長育成就，至嘉祐末，號稱多士，歐陽子之功爲多。⑤

歐陽修提倡的通經學古，使文風爲之丕變，尤其是他在嘉祐二年（一〇五七）權知禮部貢舉，六年，充御試進士詳定官，特別黜落舉子中爲文以詭異嶮怪相高者，專取詞義近古之文，以示嚮方，此後士子的文章一變而爲復古。

歐陽修仕宦四十年，在朝供職的歲月頗長，以其學有本源，且有文才史識，常被委任纂修之職。最初在景祐元年（一〇三四）任館閣校勘，參與編修三館秘閣所藏書之總目，命名《崇文總目》。三年貶知夷陵縣，離開京師。

⑤ 見蘇軾《經進東坡文集事略》（四部叢刊本）卷五十六〈六一居士集敍〉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至康定元年（一〇四〇）召回朝，再任館閣校勘，仍修崇文總目。慶曆三年(一〇四三)，修遷集賢校理知諫院，時樞密副使富弼上言請求考訂祖宗典故，編爲一書，俾行政部門取爲模範。仁宗乃命修與史館檢討王洙、集賢校理余靖、祕閣校理孫甫共同編修，明年書成，名曰《太平故事》，凡二十卷，分爲九十二門。⑥

歐陽修在嘉祐四年兼任史館修撰時，就非常留心修史制度，對當時纂修時政記、起居注和日曆之缺失，亦了解甚深，遂上書論之，請求早日革弊。他奏言：

> 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，今撰述既成，必錄本進呈，則事有諱避，史官雖欲書而又不敢書也。加以日曆、時政記、起居注例欲承前，積滯相因，故纂錄者常務追修累年前事，而歲月既遠，遺失莫存。至於事在目今可以詳於見聞者，又以追修積滯，不暇及之。若不革其弊，則前後相因，史官永無舉職之時。……其日曆、時政記、起居注，並乞更不進本，所貴少修史職。⑦

仁宗遂詔更不進呈，以後史官可以直筆而書。修又認爲記事要詳，史官當記錄親見親聞之事，如只靠諸司供報的文字來修史是不夠的。而且史館所典藏的成書亦不齊備，想檢閱故事而不可得，原因是當修成的國史進呈後，就把底稿燒掉了。修對此一缺失，也提出了建議。其云：

> 史之爲書，以記朝廷政事得失及臣下善惡功過，宜藏之有司。往時史官以本朝正史進入禁中而焚其草，今史院惟守空司而已！乞詔龍圖閣別寫一本下編修院，以備討閱故事。⑧

---

⑥ 見程俱《麟臺故事》（四部叢刊續編本）卷三下〈修纂〉條。

⑦ 見趙汝愚《諸臣奏議》（文海出版社影印本）卷六十〈上仁宗論修日曆〉。又見歐陽修《歐陽文忠公集》（四部叢刊本）卷一〇八〈論史館日曆狀〉。二者文字間有小異，今以《諸臣奏議》爲準。

⑧ 見清徐松輯《宋會要輯稿》（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本）〈職官〉十八之七九。又《麟臺故事》卷三下〈國史〉條所載相同，惟指史官爲李淑。

臺灣人文與藝術期刊資料庫

國史應典藏於史院，而不是儲放在禁中僅供皇帝觀看，仁宗依允了歐陽修的奏請，以後史官討閱故事就易於取材。修曾長時間的奉敕主修《新唐書》，又私修《五代史記》，深切了解史料的可貴，搜集的困難，所以自己勤於記錄親見親聞之事，也好留下供後代史官論定的史料。如英宗時有濮議之爭，修爲當事人之一，乃撰《濮議》四卷。治平四年（一〇六七）罷參知政事後，撰《歸田錄》二卷，自言：「歸田錄者，朝廷之遺事，史官之所不記，與夫士大夫笑談之餘而可錄者錄之。」如同唐李肇之《國史補》。⑨ 既可以有資考証，亦可以補國史之所缺。

歐陽修在史學上的貢獻是多方面的，在宋代史學家中，其地位與司馬光不相上下。

(二)劉敞、劉攽和劉奉世

劉敞（一〇一九至一〇六八）字原父，號公是，新喻人。慶曆六年（一〇四六）進士第二人。攽（一〇二三至一〇八九）字貢父，一曰贛父，號公非，敞弟，與兄同中進士。奉世（一〇四一至一一一三）字仲馮，敞子，嘉祐六年（一〇六一）進士。三人皆以博學能文顯聞於當時，揚名於繼世，號稱新喻三劉。吳澄稱揚三劉說：

> 宋東都盛時，文章經學之名世，萃於江南西一道，若廬陵歐陽公，南豐曾公，臨川王荊國公，臨江三劉公，皆前乎此所未有，後乎此未易及。名位之崇，則王曾之家位至宰相，歐公亦參大政，惟三劉公一止集賢學士，一止中書舍人，一止西樞密院都承旨，其位未稱其才。然歷三百餘年，至於今運代既易，而劉之子孫猶富盛之家，文學彬彬不絕。⑩

一個家庭中能有三位史學名家，在以前還是很少見的，實足以自豪。三劉專治《漢書》，共成《漢書標注》六卷，南宋目錄學家晁公武、陳振孫皆曾見

⑨ 見《歐陽文忠公集》卷一二六至一二七。
⑩ 見清暨用其輯《三劉文集》（叢書集成三編本）卷首吳文正公〈題墨莊譜後〉。

臺灣史料學術期刊資料庫

之，並著錄於其所編之書目中。晁氏云：

> 劉跂嘗跋其書尾云：余爲學官亳州，故中書劉舍人貢父實爲守，從容出所讀《漢書》示余曰：欲作補注未能也。然卷中題識已多，公之子方山亞夫錄以相示也。⑪

陳氏說：

> 《漢書》自顏監之後，舉世宗之，未有異其說者。至劉氏兄弟始爲此書，多所舉正發明。⑫

這說明三劉的《漢書標注》正可以補顏師古注之不足。劉敞不僅是史學家，更是經學家，於《春秋》最有研究，歐陽修奉詔修《新唐書》，便常向敞請益，商定凡例。敞著有《春秋權衡》及《七經小傳》，打破先儒的注釋，而以新義說經，實開宋儒疑古惑經之風氣。放在嘉祐八年任國子監直講，時英宗讀《後漢書》看到墾田之墾作懇字，乃詔國子監校正之，放勘定其誤謬之處甚多，多以己意推定之，治平三年（一〇六六）成書奏御，名曰《東漢刊誤》，凡四卷。王應麟說：

> 東漢刊誤四卷，劉攽嘉祐八年奉詔與錢藻等六人刊正《後漢書》，攽增損其書，凡字點畫偏傍不應古，及其文字缺衍，或引採經傳有謬誤者，率以意刊改。⑬

按：《東漢刊誤》一書之宋刻本今猶存，仍有校勘價值。就因爲攽有專精漢史研究之特長，故司馬光奉詔修《資治通鑑》時，特別延請他專修漢史長編。《宋史》說：「攽所著書百卷，尤邃史學，作《東漢刊誤》，爲人所稱頌。

---

⑪ 見晁公武《郡齋讀書志》（宛委別藏本）卷七。
⑫ 見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》（四庫全書本）卷四。
⑬ 見《玉海》卷四十九〈景祐漢書刊誤〉條。

臺灣期刊資料庫

司馬光修《資治通鑑》，專職漢史。」⑭ 這是不爭的事實。

劉奉世除精於漢書學外，其在京任職時間頗長，亦曾參與修史之事，在熙寧三年（一〇七〇）任大理寺丞時奉詔編修《經武要略》。元豐初任直史館，元祐初擢起居郎兼編修官，皆負修史重任，對仁宗、英宗《兩朝正史》之纂修付出貢獻。

㈢劉　恕

劉恕（一〇三二至一〇七八）字道原，高安人。皇祐元年（一〇四九）進士，時年纔十八，已名重公卿之間。黃庭堅稱揚他「天機迅疾，覽天下紀籍，文無美惡，過目成誦，書契以來治亂成敗，人材之賢不肖，天文、地理、氏族之所自出，口談手畫，貫穿百家之紀，皆可覆而不謬。」⑮ 所以博極群書，能以史學擅名一代。司馬光最賞識劉恕，二人對史學的觀點極一致，志趣亦相投，有一次光向恕談及有志編一部自戰國至五代繁簡適中的編年史時，恕就極力稱揚，並願有以助成之。據恕自道其事云：

> 嘉祐中，公嘗謂恕曰：春秋之後迄今千餘年，史記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，諸生歷年莫能竟其篇第，畢生不暇舉其大略，厭煩趨易，行將泯絕。予欲託始於周威烈王命韓魏趙爲諸侯，下訖五代，因丘明編年之體，倣荀悅簡要之文，網羅衆說，成一家書。恕曰：……公欲以文章論議成歷世大典，高勳美德褒贊流於萬世，元凶宿奸貶絀甚於誅殛，上可繼仲尼之經、丘明之傳，司馬遷安可比擬，荀悅何足道哉！⑯

既然二人如此志同道合，所以光在治平三年（一〇六六）受詔編修歷代君臣事跡，英宗命光自擇館閣英才共修之，光上奏說：「館閣文學之士誠多，至於專精史學，臣所得而知者，唯和州令劉恕一人而已！」當時恕正任和川縣令，光即請召恕來京共修，命恕負責分修魏晉南北朝和五代兩個斷代，共事數年，光自稱非常倚重恕，曾說：舉「凡史事之紛錯難治者則以諉之，光仰

---

⑭ 見元脫脫《宋史》（鼎文書局影印新校本）卷三一九。
⑮ 見黃庭堅《豫章黃先生文集》（四部叢刊本）卷二十三〈劉道原墓誌銘〉。
⑯ 見劉恕《資治通鑑外紀》（四部叢刊本）卷首〈序引〉。

臺灣期刊資料庫

成而已!」⑰ 故光曾一再言及恕的治史專長，非他人能比。如：

> 道原嗜學，方其讀書，家人呼之食，至羹炙冷而不顧。夜則臥思古今，或不寐達旦。在和川，嘗以公事適野，見劉聰太宰劉雄碑，知嘉平五年始改建元，正舊史之失。在洛陽，與光偕如萬安山，道旁有碑，讀之，乃五代列將，人所不稱道者，道原即能言其行事始終，歸驗於舊史，信然。⑱
>
> 十國五代之際，群雄競逐，九土分裂，傳記訛謬，歲月交互，事跡差舛，非恕精博，他人莫能整治。⑲

劉恕對魏晉南北朝史和五代史的精熟，是無人能夠和他比擬的。他私修的《通鑑外紀》，述自包犧氏，迄於周威烈王二十二年（前四〇四年），是在《通鑑》之前，故曰「外紀」。另編《通鑑外紀目錄》五卷，其體例亦全倣《通鑑目錄》。恕原編《十國年紀》，尚未完成，不幸在四十七歲的盛年病逝，由其子羲仲繼起完成之，請司馬光爲撰序文。羲仲字壯輿，亦是博學有文才之士，施元之稱他能「繼父業，有史學，道前輩事，歷歷如在目前。」⑳ 是一位克紹箕裘的令子。

㈣曾　鞏

曾鞏（一〇一九至一〇八三）字子固，學者稱南豐先生，南豐人。嘉祐二年進士，博學能文，歐陽修、王安石咸推重之，與弟布及肇俱有名於時，世稱三曾。鞏舉進士時已三十九歲，至嘉祐六年始召至京師，出任編校史館書籍，前後八年，所校畢之書多已刊刻，皆撰目錄序一篇冠於前。鞏的史學觀點是相當傳統的，譬如南朝之梁因過於崇奉佛教而亡，鞏就指出佛教徒言行不合人情，不近人理，其所自謂得諸內者，實是很妄誕的。鞏說：

---

⑰ 見司馬光〈資治通鑑外紀序〉，《通鑑外紀》卷首。
⑱ 見司馬光《溫國司馬文正公集》（四部叢刊本）卷六十五〈劉道原十國紀年序〉。
⑲ 見《溫公集》卷五十三〈乞官劉恕一子劄子〉。
⑳ 見施元之《注東坡先生詩》（藝文印館影印宋刊本）卷三十九〈劉壯輿長官是是堂〉。

臺灣期刊資料庫

> 夫學史者，將以明一代之得失也；臣等故因梁之事，而爲著聖人之所以得、及佛之所以失以傳之者，使知君子之所以距佛者非外，而有志於內者，庶不以此而易彼也。㉑

這正是本著儒家的思想以闢佛。其所以治史，應本諸以前代爲鑑之旨，師其得、戒其失，這與司馬光法善戒惡的史觀是相同的。神宗熙寧元年（一〇六八）修《英宗實錄》，鞏被任命爲實錄院檢討官，因爲院中沒有日曆可據，起居注、時政記也不完備，須要徵集史料，鞏特上〈英宗實錄院申請劄子〉，列舉十六項待徵集的史料，請朝廷速降指揮令各有司及諸路、京府供報在英宗在位期間所被的詔敕，在英宗朝亡歿臣僚合當立傳者，也令其家屬供報行狀事蹟，備作參照。所徵集範圍甚廣，只可惜他任期一個月就請求外調了。不過到次年七月，《英宗實錄》三十卷就告完成，曾鞏應當是有貢獻的。

宋廷對國史的纂修甚勤，仁宗天聖八年修成太祖、太宗、眞宗《三朝國史》一百五十卷，神宗元豐五年（一〇八二）修成仁宗、英宗《兩朝國史》一百二十卷。獨惜二者都是只有紀、志、傳而無表，不無遺憾。而且諸志述事不能一貫，重複難免，神宗以曾鞏素以史學見長，乃命鞏專任通修五朝正史之事。林希撰鞏之墓誌銘載：

> （元豐）四年，手詔中書門下曰：曾鞏史學見稱士類，宜典五朝史事。遂以爲史館修撰，管勾編修院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。近世修國史，必衆選文學之士，以大臣監總，未有以五朝大典獨付一人如公者。公入謝曰：此大事，非臣所敢當。上曰：此用卿之漸爾！因諭公，使自擇其屬。公薦邢恕以爲史館檢討。㉒

鞏奉詔後，曾連上三項申請，其中特別提到要做百官表，各志中已述的不在本紀中敍述。至於人物立傳，以有事跡可述者爲主，善惡是非之大者皆記錄，一些細故常行則不備書，是在求其簡嚴。是年十月，鞏先草成〈太祖皇

㉑ 見曾鞏《元豐類稿》（四部叢刊本）卷十一〈梁書目錄序〉。

㉒ 見陳柏泉編《江西出土墓志選編》（一九九一年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）頁三十七至四十二，〈中書舍人曾公墓誌銘〉。

臺灣大學圖書館數位資料庫

帝本紀總序〉進呈，極稱頌太祖爲三代以下撥亂反治之英主，每件行事皆超出漢高祖遠甚。文末有云：

> 太祖經始大基，流風遺澤，所被者遠。五聖遵業，至今百有二十餘年，上下和樂，無變容動色之慮，接於耳目，治安久長，自三代以來所未有也。維太祖創始傳後，比跡堯舜，綱理天下，軼於漢祖，太平之業，施於無窮，三代所不及。㉓

曾鞏立言的本意，乃是希望神宗能法祖宗，勿變祖宗之法，這自然是神宗所不喜歡聞見的。帝乃在經筵時對蔡卞說：「鞏所著乃是太祖、漢高孰優論爾，人言鞏有史材，今大不然！」五年四月，帝乃下詔罷修五朝史。㉔ 所以李心傳就說：

> 自眞廟以來，史館無專官，神宗嘗欲付曾子固以五朝史事，乃命爲史館修撰，使專典領。其後子固所草具不當神宗意，書不克成。㉕

事實上曾鞏所修的志、表、傳並未完成，亦不能僅據〈太祖皇帝總敍〉一篇文字就斷言鞏之史學名過其實。當然，罷修五朝史尙有其他因素，那就不必多討論了。㉖

鞏弟肇字子開，在熙寧元年任實錄院檢討官，參與編修《英宗實錄》，元豐初任國史院編修官，又與修仁宗、英宗《兩朝正史》，哲宗元祐初，肇任神宗實錄檢討官，擢起居舍人，遷實錄院修撰，也是一位史學家。

(五)洪适、洪遵和洪邁

洪适（一一一七至一一八四）字景伯，號盤洲，鄱陽人。中紹興十二年

㉓ 見《元豐類稿》卷十〈太祖皇帝總敍〉。
㉔ 見李燾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（世界書局影印本）卷三二五〈元豐五年四月戊寅〉條。
㉕ 見李心傳《建炎以來朝野雜記》（文海出版社影印本）甲集卷十〈史館專官〉條。
㉖ 王銍《默記》（叢書集成新編本）謂：曾鞏得罪御史中丞徐禧，禧在神宗前攻訐鞏不已，鞏遂罷職。鞏繼以丁母憂去官，不到一年鞏就逝世了。

（一一四二）博學宏詞之選。二弟遵（一一二〇至一一七四）字景嚴，號小隱，與兄同年舉詞科。三弟邁（一一二三至一二〇二）字景盧，號容齋，繼二兄之後，中紹興十五年詞科，於是三洪的文名流於士大夫間。父親皓（一〇八八至一一五五）字光弼，建炎三年（一一二九）奉命出使金國，被扣留，至宋金講和後始得歸，在金國十五年，熟知女眞民族性及其風俗、國情，撰成《金國文具錄》及《松漠紀聞》二書，是研究金朝初期歷史的第一手史料。

洪适雖然仕宦位至宰相，但治學興趣很廣，平日留心搜集材料，積之久而後便編輯成書。在紹興三十年（一一六〇）知新安時，編成《大宋登科記》二十一卷，起自太祖建隆元年（九六〇），迄於紹興三十年，凡二百年，姓名登載者二萬三千六百餘人。因爲宋朝重視功名，進士科尤盛，揭榜後，同年雅集，多編印登科錄，人手一冊，留作紀念，並傳之子孫，所以這方面的資料在當時是易於搜集的。其自序稱：「其名冠禮部籍及仕至兩地，悉爲表出；大魁若異科，則又識其鄉於下。進士自慶曆後得其小錄始可考。」㉗正說明宋朝重科名之事實。适又喜歡收集漢魏碑刻，積三十年，每「獲一漢刻，津津然盱衡擊節，輟食罷寢，摩挲而謹讀之，意世間所謂樂事直無以右此者，喟然嘆曰：天下奇寶也。」㉘ 其好古之熱情不下於歐陽修和劉敞，後編成《隸釋》二十七卷，《隸續》二十一卷。

洪遵在三兄弟中是遊宦較順遂的一位，在紹興二十八年（一一五八）三十九歲時，便已仕至起居郎、起居舍人兼樞密院都承旨，上奏請修邇英記注。奏稱：

> 陛下延見儒臣，紬繹經史，左右二史，屢進屢退，徹言善行，缺無所紀。欲自今年八月秋講爲始，經筵官除罷及封章進對、燕會賜予、講讀問答等事，悉行編錄，以邇英記注爲名。㉙

高宗應允。遵發現自紹興九年秦檜專政以來，有十五、六年起居注未修，必

㉗ 見洪适《盤洲文集》（四部叢刊本）卷三十四〈大宋登科記序〉。
㉘ 見洪适《隸續》（石刻史料新編本）卷首洪邁序文。
㉙ 見《玉海》卷四十八〈紹興邇英記注〉條。

臺灣…期刊資料庫

須趕快追補，乃請求每月帶修兩個月，也需七八年始能補齊。帝亦允從。稍後遷任中書舍人，直學士院，遷翰林學士，翰林學士承旨，掌內外制最久，特輯《翰苑群書》，將唐李肇〈翰林志〉以下至南宋〈中興學士院題名〉凡十一家，保留下很多掌故和史料。早年遷曾任婺州通判，見州衙內沒有可資查考的方輿志，乃周訪七縣山川、風俗、地理，並稽諸史冊，旁採小說，纂成《東陽志》十卷。尤其值得稱道的是：遵喜好搜集古今貨幣，凡一百多品，編成《泉志》十五卷，有圖有文，有正有僞，有皇王，有偏霸，並及於外國，援証該貫，頗爲詳博，是我國研究歷代錢幣的第一部著作。

洪邁的史學成就最高，任史官時間也最長，所修成的史書自然較二兄爲多。奉詔修成的本朝史，有《欽宗實錄》和神、哲、徽、欽宗《四朝國史》，都是很重要的。欽宗在位雖只有一年半，但遭逢國難，最爲不幸，而王室南遷，典籍、檔案亡佚，故修史爲難。紹興三十二年始命國史日曆所修《靖康日曆》，然亡於兵亂中的臣僚，如張孝純、孫傅、張叔夜等四十多人的事蹟尚缺，仍無法立傳。至乾道二年（一一六六）始粗成七十五卷，乃詔修《欽宗實錄》，並同時修正史，命邁以起居舍人兼實錄院同修撰負專責，限一年修畢。邁感到史料仍不夠，認爲靖康舊臣仍健在的只有孫覿，應命其撰寫回憶錄，上之實錄院，以補其缺。乃上奏說：

> 竊見前數文閣待制致仕孫覿，在靖康中爲臺諫侍從，親識當時之人，親見當時之事，其年雖老，筆力不衰。乞詔覿以所聞見，撰爲蔡京、王黼、童貫、蔡攸、梁思成、譚稹、朱勔、种師道、何灌、劉延慶、聶昌、譚世勣等列傳，及一朝議論事蹟，凡國史實錄所當書者，皆令條列上送本院，庶幾遺文故事得以畢集。㉚

孝宗允從，詔下孫覿就家撰述。覿遂就自己所聞見者，條列事實，申報實錄院。邁自然要參照覿所供的事實修入《欽宗實錄》中，至四年四月修成四十卷奏御。李心傳稱許《欽宗實錄》「文直而事核」，然朱熹則指責：「洪景盧在史館時沒意思，謂靖康諸臣覿尚無恙，必知其事之詳，奏乞下覿具見聞進

㉚ 見《宋會要》職官十八之六七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呈。秉筆之際，遂因而誣其素所不樂之人。」如誣李綱定計令姚平仲劫金營，誣許翰迫种師中赴敵營戰死，然事實並不是如此。所以熹說：「佞臣不可執史筆」。[31] 誠令人遺憾。

紹興二十八年七月，以修神、哲、徽宗三朝正史設國史院，先修本紀，至乾道二年，始合欽宗爲四朝，先修成本紀三十五卷。至淳熙七年（一一八〇）由李燾負責修成志一百八十卷。而列傳直到十三年始完成一百三十五卷，則由洪邁負責完成。李心傳說：

> 四朝正史始於李仁父（燾），而終於洪景盧。乾道中，仁父初入史院，上四朝帝紀，再還朝乃修諸志，未及進書而仁父去國。時史館多以爲侍從兼職，往往不能淹貫，則私假朝士之有文學者代爲之。……淳熙中，趙衛公溫叔（雄）爲相，史志告成，仁父時守建寧，大臣言仁父之力爲多，特進秩一等。久之，列傳猶未就緒，上遂召仁父卒成之。書垂成而仁父卒，乃自婺州召景盧入領內祠，專典史事，又踰歲而始成書焉；凡列傳八百七十，總一百三十五卷。[32]

《四朝國史》共經歷了二十八年始完成，曾兼任史官與修者百餘人，可見流動性很大，不能專責，遂致延誤。及至全書告成，邁遂奏請合九朝爲一，並言：「臣所以區區有請者，蓋以二百年間典章文物之盛，分見三書，倉卒討究，不相貫屬。及累朝臣僚名聲相繼，當如前史以子繫父之體，類聚歸一。」[33] 孝宗允從，並諭邁專任之。邁奉詔開院，並修成三十多卷，卻不料次年（一一八七）高宗崩殂，邁和楊萬里因爭論配享高宗廟庭功臣之事，互相攻訐，都受責出知外州，再加上已下詔纂修《高宗實錄》，遂停修九朝正史。邁所修成之史書尚有《哲宗寶訓》六十卷，《皇族登科題名》一卷，今皆不傳。至今仍流傳的他的名著《容齋隨筆》五集總七十四卷，雖是讀書劄記，卻是考證精審之作。

---

[31] 見黎靖德編《朱子語類》（大化書局影印宋刻本）卷一三〇自熙寧至靖康用人。
[32] 見《朝野雜記》甲集卷四〈四朝正史〉條。
[33] 見洪邁《容齋隨筆》（四部叢刊續編本）三筆卷四〈九朝國史〉條。

臺灣期刊資料庫

㈥徐夢莘、徐得之和徐天麟

徐夢莘（一一二六至一二〇七）字商老，清江人。紹興二十四年（一一五四）進士。得之字思叔，夢莘弟，淳熙十一年（一一八四）進士。天麟字仲祥，得之子，開禧元年（一二〇五）進士。清江徐家也是一門三傑，與新喻劉氏前後媲美，兩家都是臨江人。

徐夢莘出生在靖康元年（一一二六），次年發生靖康之難，二帝北狩，北宋以亡。高宗即位後，不敢回東京收拾破碎山河，竟然南遷避敵，從此一去不返。建炎三年（一一二九），金兵大舉南侵，先打到淮南，很快就渡江攻陷建康，並進而擾亂江西兩浙，夢莘隨母避難他鄉。他長大後，緬懷國憂家難，很想考究這次國家大難之所由來，纂成一書，垂訓將來。既舉進士，宦遊四方，隨時留心收集史料，積三十餘年，網羅到公私載籍、家乘野史、官府文書，多至二百餘家，纂成《三朝北盟會編》二百五十卷。其自序說：

> 嗚呼！靖康之禍古未有也。……揆厥造端，誤國首惡，罪有在矣！……尚忍言之哉！縉紳草茅傷時感事，忠憤所激，據所聞見，筆而爲紀錄者，無慮數百家。然各說有同異，事有疑信，深懼日月寖久，是非混淆，臣子大節，邪正莫辨，一介忠款，湮沒不傳。於是取諸家所說，及詔敕、制誥、書疏、奏議、記傳、行實、碑誌、文集、雜著，事涉北盟者，悉取詮次。……其辭則因元本之舊，其事則集諸家之說，不敢私爲去取，不敢妄立褒貶，參考折衷，其實自見。㉞

他是在很感傷的心情下纂修這部內憂外患史，起自徽宗政和七年（一一一七）宋與金訂海上盟約，迄於高宗紹興三十二年（一一六二）完顏亮大軍攻宋失敗以至於身亡，凡四十五年，包有徽、欽、高宗三朝，其採擇廣博，記述詳備，在體裁上頗有所獨創，這部專史乃是用編年體的記事方法，綱目體的敍事形式，書大事以爲綱，羅列各家載述原文以爲目，而又是專記這四十五年間宋與金的和戰始末，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將之編入紀事本末類，是極恰

㉞ 見徐夢莘《三朝北盟會編》（文海出版社影印本）卷首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當的。清儒紀昀就極稱之，說：

> 其徵引皆全錄原文，無所去取，亦無所論斷，蓋是非並見，同異互存，以備史家之採擇，故以會編爲名。然汴都喪敗，及南渡立國之始，其治亂得失循文考證，比事推求，已皆可具見其所以然，非徒餖飣瑣碎已也！㉟

這是很公允的評介。《會編》成書於紹熙五年（一一九四），當時實錄院正在修《高宗實錄》，尚未成書，同修撰楊輔等奏請下詔令臨江軍抄錄夢莘所著之書，發赴實錄院，因而得除直秘閣，被譽爲儒者之榮。

徐得之的史學成就雖不如乃兄，但他所著的《左氏國紀》三十卷，卻是一部有功於左氏的著作。他將編年史改編爲分國敍事，每國各繫以其年，然後再敍其事跡，斷以義理。陳傅良序云：

> 自荀悅、袁宏以兩漢事編年爲書，謂之左氏體，蓋不知左氏於是始矣！昔夫子作春秋，博極天下之史矣，諸不在撥亂世反之正之科則不錄也。左氏獨有見於經，故采史記次第之，某國事若干，某事書，某事不書，以發明聖人筆削之旨云爾！非直編年爲一書也。……學者誠得《國紀》伏而讀之，因其類居而稽之經，某國事若干，某事書，某事不書，較然明矣！於是致疑，疑而思，思則有得矣！徐子殆有功於左氏者也。㊱

由《國紀》上通《左傳》，纔能眞正了解左氏合記事與記言爲一之旨。

得之長子名筠，字孟堅，淳熙十一年進士，雅好漢史，著有《漢官考》四卷，「以百官表官制爲主，而紀傳及注家所載皆輯而錄之。」㊲ 是研究漢代官制的重要著作。次子天麟，是漢史專家，著有《漢兵本末》一卷，《西漢會要》七十卷，《東漢會要》四十卷，著作之富，前輩學者少有企及。周必

㉟ 見清紀昀等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（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武英殿本）卷四十九。
㊱ 見陳傅良《止齋文集》（四部叢刊本）卷四十〈徐得之左氏國紀序〉。
㊲ 見《直齋書錄解題》卷六。

臺灣大學圖書館數位資料庫

大〈漢兵本末序〉說:

> 臨江自三劉有功漢史，其學盛行。今徐筠孟堅既爲《漢官考》四卷，季天麟仲祥又惜司馬遷、班固不爲兵志，於是究極本末，類成一書，注以史氏本文，具有條理，凡中外諸軍，若將帥之名，與夫賞功伐罪，繇戍、簡稽、兵器、馬政，參互討論，略無遺者。㊽

清江徐氏正是繼新喻三劉之後精研漢史，成就最大的爲天麟，他倣《唐會要》體而纂成兩漢會要。《西漢會要》成於寧宗嘉定四年（一二一一），分十五門，三百六十有七事，樓鑰爲之序，極稱徐氏「昆仲父子兄弟四書俱行於時，俱有益於世用。」㊾《東漢會要》成於理宗寶慶二年（一二二六），亦分十五門、三百八十有四事，自爲序，謂欲補《後漢書志》中所未詳述之食貨、兵、刑、學校、選舉各類事目，以備一代之大典。並指出東漢節約尚儉，雖中葉以後政移戚宦，然仍綿延二百年之國祚，乃是憑藉綱紀法度來維持的。《四庫提要》稱許兩會要有功於兩漢史，有裨於考典制。

(七)蕭　常

蕭常字季韶，號晦齋，廬陵人，鄉貢進士，受鄉賢歐陽修之影響，雅好史學，曾遍讀諸史，很不滿陳壽《三國志》以魏繼漢，不禁慨然而嘆道:「曹操死且千年矣，猶得爲地下之幸鬼乎?」見其父壽朋早已有志於改寫三國鼎立時代之歷史，但沒有成書就去世了。常乃承父遺志，積二十年，於慶元六年（一二〇〇）修成《續後漢書》四十二卷，帝紀、年表各二卷，列傳十八卷，吳載記十一卷，魏載記九卷。周必大序云:

> 今廬陵貢士蕭常潛心史學，謂: 古以班固史爲《漢書》，范曄史爲《後漢書》，乃起昭烈章武元年辛丑，盡少帝炎興元年癸未，爲《續後漢書》，既正其名，復擇注文之善者併書之。……昭烈土地兵甲甚非

㊽ 見周必大《周文忠公集》（四庫全書本）卷五十四〈漢兵本末序〉。

㊾ 見樓鑰《攻媿集》（四部叢刊本）卷五十三〈西漢會要序〉。所謂四書即指《北盟會編》，《左氏國紀》，《漢官考》和《西漢會要》，故稱其家長於史學。

臺灣期刊論文索引資料庫

> 周比，興於漢中，適與沛公始封國同，天時人事，決非偶然，孔子復生，必有以處此?㊵

常認爲昭烈帝之漢與高祖、光武之漢是一系相承的，故他的《續後漢書》也是與班、范之史相接的。這是相當高的義理觀念，足以振奮人心，息止邪說，導政治於正道。

㈧馬廷鸞和馬端臨

馬廷鸞（一二二二至一二八九）字翔仲，號碧梧，饒州樂平人，理宗淳祐七年（一二四七）禮部試第一名，中進士高第，由池州教授召試館職，任秘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。後歷官著作佐郎，秘書少監，權直學士院。景定四年（一二六三）除起居舍人，兼國史院編修官、實錄院檢討官。度宗即位後，歷任簽書樞密院事、同知樞密院事、參知政事，拜右丞相，提舉編修《經武要略》。因受制於賈似道而力辭，於咸淳八年（一二七二）罷相，居家教子，宋亡後，元廷曾加徵召，守志不出，專心著述以終老。所著《讀史旬編》三十八卷，倣呂祖謙《大事記》的義例，本邵雍《皇極經世》和朱熹《通鑑綱目》紀年之法，起自堯甲辰，至周世宗顯德六年（九五九），凡三千三百一十七年，十年爲一旬，共爲三百三十二旬，自序云：「閱諸家之史以廣其見聞，集諸儒之說而訂其得失，若征伐之本末，制度之沿革，亦粗及之。」自戰國至五代，既列事目，亦抒發所見，今觀廷鸞的《碧梧玩芳集》中所載論商鞅之失亦兼及王安石，評呂后之惡並及於歷代女主禍國，內寵足以亂天下，頗能發人深省。遺憾地是這部書沒有流傳下來。㊶

馬端臨（一二五四至一三二四）字貴與，號竹洲，廷鸞次子，十九歲以蔭補官，二十歲中鄉試，以奉親故未赴省試。德祐元年（一二七五），元兵下江南，攻陷各州府，進圍臨安，次年宋帝降元，江西路已爲元所有。宋亡後，端臨亦不應元廷之徵辟，家居治史，積二十餘年之廣搜博徵，纂成《文

㊵ 見《周文忠公集》卷五十三〈續後漢書序〉。

㊶ 見馬廷鸞《碧梧玩芳集》（叢書集成續編本）卷二十一〈讀史旬編〉。案：《讀史旬編》全書久佚，清乾隆中修四庫全書，館臣從《永樂大典》中輯出緒論十多篇，合成一卷，附於文集之末。

臺灣大學圖書館資料庫

獻通考》三百四十八卷，卷帙浩瀚，遠過於司馬光之《資治通鑑》。及至元仁宗延祐四年（一三一七），弘文輔道粹德眞人王壽衍奉詔到江南訪尋道行之士，至饒州而得端臨，特加保薦。據饒州路儒學申狀云：

> 本路樂平州儒人馬端臨，前宋丞相碧梧先生之子，昨蒙都省咨發再任衢州路柯山書院山長。……本儒行履端純，詞章雅麗，家傳鼎鼐之譜，幼翻館閣之儲，知前代之典章，識當世之體要，所見所聞，著爲成書，名曰《文獻通考》，凡二十四類，三百四十八卷。……凡於治道有關者，無不彪分彙列，治國安民，特舉而措之耳！其可謂濟世之儒，有用之學。……㊷

《通考》成書於元成宗大德十一年（一三〇七），凡分田賦、錢幣、戶口、職役、征榷、市糴、土貢、國用、選舉、學校、職官、郊祀、宗廟、禮、樂、兵、刑、經籍、帝系、封建、象緯、物異、輿地、四裔，共二十四考，在各考中，端臨常引用其父之言論，冠以「先公曰」發端，如同司馬遷的「先人有言」，可見是父子相承的。

三、江西史學的特徵

㈠義理史學

宋代史學受經學的影響很深，特別是受《春秋》的影響。劉敞著《春秋權衡》，教學者當如何善用天下之公器，權衡輕重，既準且平，要能得天下之公信，必須自己先要有從善服義之公心。史家修史，評論往古人事，無虛美，無隱惡，也必須本諸公正之心。孔子修《春秋》，重褒貶，使善惡、是非、邪正、忠奸截然分明。宋代史家不論修前代史或當代史，褒貶是不能避免的，都暗示是本於《春秋》大義。歐陽修修《新唐書》及《新五代史》，自不例外。據不著撰人的《經史百家制度》中所載〈歐陽公存大義〉條云：

㊷ 見馬端臨《文獻通考》（大化書局影印本）卷首附「抄白」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> （新史）立法命意動以《春秋》爲的，〈春秋〉所以因魯史之疑而闕之者，爲勸懲者存，而區區細故臧否不繫焉者，略之可也。公爲〈武后紀〉，則與之名以著其罪。於〈禮樂志〉，則明三代禮樂之本出於一，而後世爲虛名。於〈五行志〉則不書事應，以破漢儒災異傳會之說。其論撰莫不有體，深得夫子之用心矣！㊸

欲知歷史之變遷，先觀人才之賢奸進退，對其大是大非不能不辨。史家修史要在掌握其大者，略去其小者，即孔子「筆則筆，削則削」之義。歐陽修修唐、五代史，意在法《春秋》之簡嚴，其所以表明是非善惡者，必藉褒貶以顯現，勸戒之功效就在其中了。如歐陽修評唐太宗，就有褒有貶。他說：

> 其除隋之亂，比跡湯武，致治之美，庶幾成康，自古功德兼隆，由漢以來未之有也。至其牽於多愛，復立浮圖，好大喜功，勤兵於遠，此中材庸主之所常爲。然《春秋》之法，常責備於賢者，是以後世君子之欲成人之美者，莫不嘆息於斯焉！㊹

上文前段褒其功，後段貶其過，十分顯明，意在讓後世之爲人君者，知所法戒。心存經世之志，與司馬光並無差別。其私修之《新五代史》，更是敍事與議論相間，其所立傳皆爲彙傳，隱含褒貶，在我國二十五史中，是非常突出的。據歐陽發所述是：

> 其於五代史尤所留心，褒貶善惡，爲法精密，發論必以嗚呼，曰：此亂世之書也。其論曰：昔孔子作《春秋》，因亂世而立法治，余述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，此其志也。㊺

歐陽修對於本紀立法精密，文省而事備，非司馬遷、班固等人所能及。而在

㊸ 見趙鐵寒編《文廷式全集》（大華印書館印行）第三冊〈永樂大典輯佚書〉內。
㊹ 見歐陽修等《新唐書》（鼎文書局影印新校本）卷二〈太宗紀贊〉。
㊺ 見歐陽修子發等述〈先公事跡〉，載《歐陽文忠集》附錄五。

臺灣

各代本紀末所抒發之評論及各彙傳前所述之敍論，皆本人倫大節以立言，對亂臣賊子的批判，是毫不留情的，如痛責晚年自稱爲安樂公的五朝元老馮道爲最不知廉恥者，[46] 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。修尙著有正統論，對國史上朝代如何論定其地位提出新看法，所謂正統，蓋指「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，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。」有的朝代是統而不正，如西晉和隋是：有的朝代是正而不統，如東晉和後魏是；既正且統的爲夏、商、周、秦、漢和唐，並認爲漢、晉之間是絕統。[47] 可以說歐陽修並沒有認定昭烈帝繼漢獻帝而居正統，不過到了南宋，國家形勢大變，與漢昭烈帝和晉元帝之處境相類，史學家遂重新檢視三國時代的歷史，前述蕭常所著之《續後漢書》，就是在這樣的國家處境下立意改編《三國志》而成書的。歐陽守道跋云：

> 建安庚子之冬，漢天子位爲丕所篡，次年四月，昭烈始稱大號於漢中，蓋已曠數月矣！然則以昭烈之元，上接建安末歲，爲正統，何疑於獻帝之猶存乎？蕭氏書法，與朱公《通鑑綱目》合，綱目於建興十二年書魏山陽公卒，若曰：獻帝至此特魏之山陽公，魏有山陽公而漢無獻帝也。蕭氏作書時，《通鑑綱目》未出，可觀我心所同然矣！[48]

強調昭烈帝章武之元年上接建安末歲爲正統，足以警戒逆賊篡位，這也是義理，是合乎《春秋》「誅亂臣、討賊子」之大義的。蕭常評論三國人物，頗有獨見，本《春秋》責賢之義，改論爲贊，王肅贊便直責肅曲學阿世，爲小人之尤，亦屬義正而辭嚴者。

(二)金石考據之學

王國維說：「金石之學創自宋代，不及百年，已達完成之域。」宋代學者考訂金石的方法是：「據史傳以考遺刻，復以遺刻還正史傳。」這也是二重證法。[49] 開創宋代金石學的是劉敞和歐陽修。劉敞喜好收集古器物，與歐陽修

---

[46] 見歐陽修《新五代史》（鼎文書局影印新校本）卷五十四〈雜傳〉之敍論。
[47] 見《歐陽文忠公集》卷十六〈正統論〉。
[48] 見歐陽守道《巽齋文集》（四庫全書本）卷二十一〈跋續後漢書〉。
[49] 參見王國維〈宋代金石學〉一文，文載《國學論術》一卷三號，臺聯國風出版社影印本。

臺灣期刊資料庫

志趣相同，他在出鎮永興軍時，在長安近郊獲得三代時的鐘鼎器皿數十件，皆有篆刻銘識，文字奇古，他細加研究，用以考訂三代制度，得出與前代學者不同的結論。[50] 編成《先秦古器圖》一卷傳世，遂開風氣。歐陽修一生收集三代以來金石刻拓本一千卷，編成《集古錄》十卷，自爲跋尾，凡二百九十六篇。並命其季子棐爲之考釋，又成《集古錄目》十卷，修序云：「乃撮其大要別爲錄目，因並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繆者，以傳後學。」[51] 以鐘鼎碑刻的記載，來證史傳之謬，或補其缺，對史學研究貢獻最大。朱熹稱讚說：「集錄金石，於古初無，蓋自歐陽文忠公始。」[52] 可以確定其在金石學史上的地位。

繼歐陽修的爲曾鞏，他也集古今篆刻編成《金石錄》五百卷，卻沒有傳於後世，《元豐類稿》卷五十仍存有〈金石錄跋尾〉十四篇。繼曾鞏的則爲洪适，他編的《隸釋》和《隸續》，集漢隸之大成，不但全錄碑刻原文，後面附考釋，如《隸釋》卷六載〈中常侍樊安碑〉，碑文稱字子仲，桓帝永壽四年（是年六月改元延熹元年、一五八）二月卒，延熹三年始刻石立碑。适考釋云：「其末又載延熹元年八月丁酉贈騎都尉詔，趙氏遂以碑爲元年所立，而歐公云字子佑，皆誤也。」不僅訂正前賢之失，更保存了研究漢史的第一手史料。宋儒張淏便極頌揚《隸釋》，他說：

> 秦漢以前字畫多見於鐘鼎彝器間，至東漢時石刻方盛。本朝歐陽公始酷嗜之，所藏至千卷，既自爲跋尾，又命其子棐撮其大要而爲之說，曰《集古錄目》。晚年自號六一居士，集錄蓋其一也。其門人南豐曾公（鞏）亦集古篆刻爲《金石錄》五百卷，後來趙公明誠所蓄尤富，凡二千卷。……近時洪文惠公适集漢魏間碑，爲《隸釋》、《隸續》凡四十八卷。……《隸釋》復刻其文，前代遺編墜款因得概見於方策間，尤可貴也。[53]

---

[50] 見劉攽《彭城集》（叢書集成新編本）卷三十五〈集賢院學士劉公行狀〉。
[51] 見《歐陽文忠公集》卷一三四。
[52] 見《朱文公文集》卷八十二〈跋歐公全石錄序眞蹟〉。
[53] 見張淏《雲谷雜記》（叢書集成新編本）卷三。

臺灣博碩士論文期刊資料庫

清儒盧文弨亦最推崇洪氏之二書。據云:

> 宋考據金石文字者，其傳有歐陽氏、趙氏、洪氏、董氏（逌），……其大體要必以鄱陽爲最善。蓋三家或偶舉一義，或偏撮數言，而唯《隸釋》之作，則全寫其文，亦悉摹其形，缺者具著其所缺多寡之數，雖灼然可知其爲某字者亦勿之益，後之人撫其遺文而讀之，則時代之升降，文章之淳漓，字畫之正變，事跡之詳略，體式之異同，雖去其人千載之遠，而其面貌若可彷彿而得，但謂可資以資正史傳，此猶屬一隅之論也。[54]

能保存碑刻的原貌，而且以非常謹嚴的態度處理之，對後學產生示範作用，這是值得稱讚的。适二弟遵著《泉志》，「凡有文字可紀，形象可繪者，莫不畢載，頗爲詳博。」有助治史者了解歷代幣制。在金石學方面，江西史學家著作最富，貢獻也最多。

研究金石不是僅僅著錄，還是需要考訂，使之應用到歷史與典制的研究上。宋代史學家治史，很留意史實的考證，前述洪邁的《容齋隨筆》，是一部以考據爲主的著作。清儒李慈銘最推崇此書，他在《日記》中，常就所閱及者記下研讀此書的心得，有褒有貶。就整體言之，還是認爲考證多精的。他評道：

> 看《容齋隨筆》自一筆至五筆訖。南宋人如洪景盧學問賅博，爲不數見。此書考證多精，識議亦勝。並時說部，最爲可觀。予嘗論南渡後王觀國《學林》之經學、字學，吳曾《能改齋漫錄》之雜學，王應麟《困學紀聞》之史學，可謂蒼卒衆有，縱橫一時，擷其所長，蔚乎可述。洪氏雖不能奄有諸妙，頗亦兼諸厥能。……[55]

洪氏不僅長於考證，而且善述宋朝時事及典章制度，多極精核，今日研究宋

---

[54] 見明都穆《金薤琳瑯》（石刻史料新編本）卷首盧序。

[55] 見清李慈銘《越縵堂讀書記》（台北世界書局中國學術名著本，民國五十年出版）頁九四八。

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

史的學者，不可以不留意此書。

(三)疑古之精神

宋代疑古風氣，實自劉敞開之，他的《七經小傳》，改變先儒的成說，而以新義解釋之，於是在自由的學風下，聖人之經受到了質疑。敞曾疑《禮經》不是醇經，其言道：「今之《禮》非醇經也。周道衰，孔子歿，聖人之徒，合百說而雜編之，至漢而始備，其間多六國秦漢之制。」也深責孟子對或問「舜爲天子，皐陶爲士，瞽叟殺人，則如之何」的答覆，爲「察而不盡理，權而不盡義。」[56] 不合義理之言是會貽笑大方的。至於歐陽修治經，對先儒注疏有所不通者，加以辨明，凡十數事，如「五帝不必皆出於黃帝，春秋趙盾弒君非趙穿，許世子非不嘗藥，武王十一年非受命之年數。」[57] 又力破漢儒災異附會、五德終始之說，對於史學研究有很大的啓發作用。

劉恕協助司馬光修《資治通鑑》，光長於考證，但基本史料都是助手收集的。恕所自撰的《通鑑外紀》，所記史事是在《通鑑》之前，屬古代史，自然要敍述傳說中三皇、五帝，恕對此存疑，乃發出以下的議論：

> 秦初幷六國，丞相等議帝號，曰：古有天皇，有地皇，有泰皇，泰皇最貴，臣等上尊號王爲泰皇。王曰：去泰著皇，采上古帝位號，號曰皇帝。乃知秦以前諸儒或言五帝，猶不及三皇，後代不考〈始皇本紀〉，乃曰兼三皇五帝，號曰皇帝，誤也。[58]

三皇之說不見於六經，乃是漢朝以後的儒者所追述的。清代疑古派的史學家持此說其堅，實乃自劉恕發之。至於宋儒疑經改經，甚爲廣泛，乃當時之新風氣使然。經既能疑，古史更不用說了。

(四)當代史的編修

宋代君臣很留心國史的纂修，有起居注、時政記等記錄之史，有聖政

---

[56] 見《公是集》卷四十六〈疑禮〉，卷四十七〈明舜〉。
[57] 同註四十三。
[58] 見《通鑑外紀》卷一末〈劉恕曰〉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記、寶訓、日曆、實錄等編輯之史，更有紀傳體的正史，極爲詳備。修史靠擇史官，朝臣中有文學的，往往被命兼任史職，與修國史，如歐陽修、曾鞏、洪邁等皆曾供職史院，負責修不同的史書。不過元代以後，宋代官修的當代史，絕大部份都已散佚，只有私修的本朝史，尚幸而流傳下來，如徐夢莘的《三朝北盟會編》是最值得稱述的了。

《三朝北盟會編》和李燾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、李心傳《建炎以來繫年要錄》，被譽爲宋人所修的三大本朝史鉅著。二李之書是繼司馬光《資治通鑑》而作的，乃是編年史，原則上是「寧失於繁，勿失於略，」將所收集的史料融會在一起，用自己的文字貫穿起來，平舖直敍，逐日記事，凡政治、軍事、外交、學術、社會、經濟、典制等無不包容，遇到有不同記載，也略作考異，說明去取的理由，或申述己見，爲賢者辨誣。如《長編》卷十七記太祖之崩後所附之考異，辨《建隆遺事》一書並非王禹偁之著作，乃是怨家仇人託名以欺世的。《要錄》卷一百九十四於記載采石之捷後，在考異中引錄八種記事，各不相同，有的不免責怪虞允文誇大功勞。但心傳卻很公正客觀的說：「斯時大敵當前，軍心渙散，如果沒有允文身在兵間，激勵將士，萬一敵人渡了長江，那麼大局還能夠收拾嗎?」夢莘的《會編》是專記宋與金的和戰關係，所以稱爲「北盟」，蓋專指對金朝而言，所謂「凡事涉北盟者悉取詮次」，則不涉北盟者就不記錄，並不是逐日記事的，有的相隔數月，有的記載特別詳細，如卷三十四載靖康元年二月五日陳東上書請用李綱一事，就用了一全卷，引錄五種史料，完全照錄原文，均低一字，不加按語，不作評論，以待將來的史家採擇。但忠臣義士、亂臣賊子善惡之跡都呈現出來了。而在卷二百一十九中，載紹興二十二及二十三兩年，各記四事，並未引史料，因爲皆例行事，無關宏旨。這就是《會編》的特色，與二李的著作在編輯體例、方法和取材上都是不盡相同的，頗有創新的意味，值得肯定。特別是他在書前詳列了參據書目，達一百數十種，這在以前的史家名著中尚未出現過，這是很負責任的態度，讓研讀此書的並世賢哲和後生晚學了解其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事事有根據，眞在做到不虛美、不隱惡，樹立一個典範，讓後學有以取法。[59]

(五)典章制度史之纂輯

典章制度史之記述，本之《史記》的八書和《漢書》之十志，自唐杜佑綜述歷代典制而成《通典》，蘇冕類編本朝故事修成《國朝會要》，咸認爲有裨益於時政。

宋代江西之史家，對於典制史之纂修特別盡力，有承先啓後之功。歐陽修雖本《春秋》以修前代正史，但極重視各種類事之志，《新唐書》之兵、儀衛、選舉三志，便是《舊唐書》所沒有的。曾鞏極留心典制，所撰〈本朝政要策〉，列考課、訓兵等四十五項，[60] 皆是檢討當代已推行之要政。南渡後，洪邁供職國史館、實錄院最久，熟知本朝故事，又能博覽古今載籍，所著《容齋隨筆》五集七十四卷，考證前代典制與宋朝政經制度者頗多，只是分散各集中，沒有統系。眞能夠究一代之典制者，則爲徐天麟之兩漢會要。其《西漢會要》序云：

> 竊惟三代而下，言治者必首漢唐，今唐有會要，而漢獨未備，見謂闕典。臣究心班史垂二十年，……是用不量譾薄，輒倣唐及國朝會要，彪分貯析，輯成《西漢會要》七十卷，……于是西都一代之制燦如日星，與唐之制度紀綱，皆得媲聖朝高文大冊，同垂不朽。……遡流尋源，循末推本，則由西都之制可以求三代禮樂之遺，因漢唐之粗可以彰聖朝文物之盛，斯亦列聖垂摹之本意也。[61]

天麟纂述之旨，既欲以備史書之闕典，又志在彰顯宋朝典制之美備，庶幾鑑古知今，則是非得失，粲然分明。何者當法，何者應戒，亦有裨益於世教。

---

[59] 關於《三朝北盟會編》之研究，陳樂素早年曾撰一文爲〈三朝北盟會編考〉，發表在中央研究院《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第六本第二、三分上，民國二十四、五年出版。後增訂刊入陳氏《求是集》第一集中，一九八六年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。對於本書的內容，參據書目，史料的校補，徵引典籍之考證，皆一一述及，極爲詳博，可以參考。

[60] 見《元豐類稿》卷四十九〈本朝政要策〉。

[61] 見徐天麟《西漢會要》（舊抄本）卷首。

天麟又纂《東漢會要》，兩書體例一致，均是斷代的典制史。其能會通古今典制而成之鉅著，則爲馬端臨之《文獻通考》，起自唐虞以前，終於有宋寧宗嘉定之末，上下三千五百餘年，實爲《通典》以後最詳備的典章制度之通史。端臨自序云：

> 唐杜岐公（佑）始作《通典》，肇自上古，以至唐之天寶，凡歷代因革之故，粲然可考，……天寶以後蓋闕焉！有如杜書，綱領宏大，考訂該洽，固無以議爲也。然時有古今，述有詳略，則夫節目之間，未爲明備，而去取之際頗欠精審，不無遺憾焉！……愚自早歲蓋嘗有志於綴輯，……自今業紹箕裘，家藏墳索，插架之收儲，趨庭之問答，其於文獻蓋庶幾焉！嘗恐一旦散軼失墜，無以屬來哲，是以忘其固陋，輒加考評。……[62]

很明顯地是：他是繼承父親遺志，增補《通典》之所未備，並強調典章制度是古今相因的。而司馬光的《資治通鑑》僅詳於治亂盛衰，然歷代之興亡治亂並不能相因，所以他纂輯《通考》，集歷代典制之大成，以與《通鑑》相互補益。使我國歷代史籍更爲完備。

四、結　論

宋朝建國後，重視吏治，強化文化建設，很快的便走出五代動亂的陰影。到了仁宗時代，不僅政治清平，社會安和，而且學術振興，經學、文學、史學都有新的發展，理學也產生了，從整體來看，這無異是黃金歲月。宋朝承繼後漢、後周，建都開封，最初勢力範圍也只限於黃、淮河流域，中原因長期戰亂，農業生產減少，民生極爲艱困，教育與文化建設更是無法推行了。南方地區性的政權，能夠保境安民，反而有了進步，時日益久，乃遠遠的超過了北方，江西便是在各方面都較進步的地區，眞宗以後，江西籍的晏殊、王欽若都仕至宰相，打破了「南人不得爲宰相」的慣例。

---

[62] 見《文獻通考》卷首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史學不是空談，修史必須根據史料，宋代史家幾乎人人勤於收輯史料，除了書籍、檔案外，崇山、禪院、陵墓的碑刻，地下的先民遺物，都留意到了。今日史學界所重視的考古學，無疑是宋代金石學的延續。史家要有史識，修前代史免不了有褒有貶，歐陽修修唐、五代史，便是本之《春秋》以立言的，所褒者善，所貶者惡，善莫如忠孝節義，惡莫過於不忠、不孝、不節、不義，是非常分明的。修本朝史，不免有曲筆，但忠君愛國精神之發揚，史家已盡了很大的責任，這是最值得肯定的。北宋時，疆土尚稱遼闊，國勢亦不算太弱，在歷史上的正統地位並沒有感受到威脅，史家也就不太強調三國時蜀漢之是承漢正統。但是到了南宋，已屬偏安政權，北方的金朝強過曹魏，有取代宋朝而居中國歷史正統之勢，史家乃改修三國史，以昭烈繼漢獻帝。甚至馬端臨《通考》，竟將遼、金列入〈四裔考〉中，乃強烈地夷夏觀念所使然。顯然兩宋國情不同，對史家之修史是有其影響的。

總之，宋代江西史學很盛，到明清時代雖然比不上浙東，但這些史家治史精神，及其所開創的史學領域，仍然產生極大的影響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